

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翻译与思考^{*}

刘亚丁

一、厚重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 И. Л. 季塔连科院士主编, А. И. 科勃泽夫教授和 А. Е. 卢基扬诺夫教授担任副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共六卷, 编纂历时 15 年, 2010 年始告完成。《大典》第一至六卷分别为:《哲学卷》(2006 年, 727 页)、《神话·宗教卷》(2007 年, 869 页)、《文学·语言与文字卷》(2008 年, 855 页)、《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文化卷》(2009 年, 935 页)、《科学·技术·军事思想·卫生·教育卷》(2009 年, 1087 页)和《艺术卷》(2010 年, 1031 页)。《大典》从哲学、宗教、历史观念、政治、法律、科技思想、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和当今文化进行了全面诠释, 集中体现了俄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大典》的作者团队已获得了各种奖励和荣誉。胡锦涛主席在 2009 年 6 月访俄期间, 授予季塔连科院士“中俄关系 60 周年杰出贡献奖”。《大典》的主编季塔连科, 副主编科勃泽夫、卢基扬诺夫 2011 年因“推动俄罗斯和世界汉学, 编纂厚重的、学术性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荣获俄罗斯国家奖。去年 9 月季塔连科院士又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据新华社报道, 今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会见俄罗斯汉学家, 卢基扬诺夫教授发言, 他介绍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习近平主席回应他的发言, 也提到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厚重, 早已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有关人员一直关注《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写作出版,

从 2010 年初开始我和李志强教授分别在《人民日报》、《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俄语教学》、《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等报刊发表有关《大典》的评介文章。2010 年 9 月我校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举行成立仪式, 以《大典》副主编卢基扬诺夫为团长的俄罗斯汉学家代表团一行八人出席成立仪式, 将六卷《大典》赠送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2011 年 12 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征集选题时, 我代表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提出、论证了“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选题。2012 年 6 月国家社科规划办将该选题列入 2012 年第三批重大项目举行招标。2012 年 4 月, 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签署了六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翻译合同。2012 年 10 月“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获准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12 年第三期)。该项工程一直得到相关领导与全国专家大力支持, 详细情况已在《俄罗斯文艺》发表, 故不赘述。

二、《大典》中文翻译的难点与我们的态度

《大典》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文化的十来个学科, 在词条和文章中涉及到大量的中国相应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在行文中有大量的中国古籍和专业文献的引文; 而我们的翻译团队的大部分成员是我国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的研究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2012 年第三批)(12&ZD170)资助。

者、翻译者,对中国文化相应学科未做过研究或了解不够。翻译工作所面临的难点有:

(一)如何解决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解:翻译不仅是语言的对译,而且是对原文所述对象的再阐释。因此,如果我们在《大典》的翻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本身理解不到位,则势必会影响翻译的质量。而我们的团队成员在这一点上有着明显的欠缺,所以,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整个翻译工程的首要问题。

(二)如何解决对俄罗斯学者学术立场的理解:翻译不仅是对原文所述对象的再阐释,同时也是对原文作者立场的再阐释。因为如果不理解原文作者的文化立场,则无法精细地理解原文所表达的价值观念,也就会影响到翻译的准确性。仅仅做一种文字的对译不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在翻译过程中准确传达俄罗斯学者的外位视角,从而为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理解提供参照。因此,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保证我们整个工程的关键环节。

(三)如何解决原文还原的问题:《大典》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中有大量对中国典籍和中国现当代文献原文的征引,在整体阐述中,还有大量中国文化相关术语的移用。以往在国内的翻译作品中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很多,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难以体现我们整个翻译工程的严肃性与学术品格。

我们整个翻译工作具有学术严肃性,我们的态度将体现在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我们的翻译不是一种普通的文字翻译,甚至也不是一种文学翻译,而是一种文化翻译。我们的学术态度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理解并确立我们自身的中国文化观:要翻译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著作,我们自己首先要成为中国文化的入门者甚至是专家,我们不仅要通过对中国文化典籍的阅读来完善我们的相关知识,还要研究并熟悉本土的中国文化研究学术史,即了解中国本土学者的代表性观点;在这个基础上,确立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观。

(二)理解俄罗斯学者的中国文化观:《大典》是俄罗斯汉学界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对中

国精神文化的铺叙和介绍,因此,其中渗透着俄罗斯学者的个人立场和文化价值观,而这种立场和价值观与中国本土学者和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存在着基于不同文化语境的理解差异。因此,这个翻译工程就不仅是简单的文字理解,而是“文化理解”。

(三)在确立我们自身文化观和理解俄罗斯学术文化观的基础上,对原文的文化立场保持一种评判的姿态。这种评判姿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姿态,对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加以重视和借鉴,借以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文化,为国内的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新的活力;二是以评判者的姿态发现问题,洞悉域外学者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误读”性理解,其目的不是否定他们的研究,而是理解不同的精神文化结构是如何造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差异的,从而发现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二者可以达成沟通的可能性。

三、针对翻译难点的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学术态度,我们的翻译不仅是翻译活动,而且也是复杂的研究活动。为了使这一工程能真正体现我们的学术态度,保证翻译质量,具体有以下九种解决方案:

(一)“先学后译”法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涉及到中国的精神文化的若干领域,牵扯到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自然科学等若干学科。显然,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还无法组成一个既精通俄语、又精通中国文化各领域的学术团队。因此学习有关知识就是本翻译团队的首要任务。这里的学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学习,可借用严绍盪先生对操作中国学的学者的要求。他指出作中国学的研究者应具备四种素质:1)必须具备本国文化的素养,包括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2)研究者必须具备特定对象国的素养,也包括历史哲学素养;3)必须具备文化学史的基本素养;4)研究者必须具备两种以上的语文素养,必须具备汉语素养,同时必须具备对象国的语文素

养。(严绍璁《我对 Sinology 理解和思考》,《国际汉学》第四期)本翻译团队成员的俄文水平很高,对俄罗斯文学和文化有深入的理解,但除了第二项第四项中的第二部分外,其他知识素养是须刻苦学习才能获得的。总地说,广义的学习就是对所翻译对象的相应知识的整体学习。在进入具体的翻译过程前,不同的翻译团队应针对所译知识领域进行全面系统的学习,使译者成为中国相应学科的行家。如翻译《历史思想·政治与法律文化卷》的团队,首先应学习中国的正史,对二十四史的基本内容,对《资治通鉴》等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唐六典》、《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要熟悉研究,使团队对历史思想和政治法律文化等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翻译《神话·宗教卷》的团队成员,则学习研究相关的神话典籍和学术著作,如《庄子》、《淮南子》、《山海经》、《楚辞·天问》、《中国神话辞典》等,应学习了解《十三经注疏》、《四书章句》、《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道藏(《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佛藏(《新修大正藏》、《卍续藏经》、《中华大藏经》、《五灯会元》)等儒释道基本典籍,使自己成为中国神话宗教专家。

其次是狭义学习。翻译的过程的第一步,是对所译研究文章或词条开列的参考文献进行学习和研究。比如翻译《神话·宗教卷》关于《太上感应经》的词条,就要先研读《太上感应经》的中文原文;翻译《艺术卷》的词条“图画见闻志”,就要先研讨郭若虚著、俞剑华注的《图画见闻志》的中文本,最好是俄罗斯作者使用的人民美术社1963年版本,同时还须参考俄罗斯作者所列参考文献《画论丛刊》,对有关《图画见闻志》的部分加以参阅。再如《历史卷》中的“中国民族学说”部分,翻译前应先阅读其中涉及、征引的梁启超《中国国民之品格》、《论中国之将强》等文章,而且尽量用《大典》作者所用的版本,如《饮冰室文集》等。只有经过这种译前学习,才可能准确理解并写出顺畅无误的翻译文本。

(二)“以注代评”法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对俄专家的客观

的立场表示尊重,同时表达我们自身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对《大典》词条或文章中的知识性“硬伤”,我们要以脚注的方式指出。因此,中译本指出《大典》的知识性硬伤后,俄方出《大典》的修订本时可加以参照,予以修订。在翻译过程中对《大典》的文化立场,我们除了对俄专家客观性评价表示尊重外,还可用别的方式表达我们自身的中国文化观。因此,对有关的问题的深入考察,还会产生学术探讨的热情和责任,还要写成论文发表。

(三)“讨论求解”法

通过发挥团队的作用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个人在翻译中遇到难点,可先向本卷主编求助。若本卷主编依然难以决断,则可发邮件给本卷的成员,大家讨论解决。甚至可能有本卷都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则可发给其他卷的主编或成员,大家集思广益,毕竟会解决疑难问题。各卷的主编在开题会上也表示,遇到疑难问题时,要就近向本单位的文史专家咨询。

(四)“顾问解惑”法

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担任顾问的李明滨先生、吴元迈先生、项楚先生和季塔连科院士、卢基扬诺夫教授和科勃泽夫教授的智力咨询作用。一些关键性的疑难问题,可以向他们求教。还可以通过俄方的顾问,直接与《大典》的文章和词条的原作者联系,在与他们的沟通中解决疑难问题。

(五)“网络光盘查询”法

翻译中最困难的工作是文章词条中所引中国古籍的还原问题。对《大典》所引中文,要杜绝望文生义,避免猜译。借助“先学后译”法,则可确定俄文作者所使用的中国古籍的范围,而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古籍都有网络版,如“国学宝典”等,通过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则可查出俄文所引的原文。如在《大典》《哲学卷》“荀子”词条中,俄文作者引用了这样一句话:“благородный муж (цзюнь цзы) почитает находящееся в себе.”觉得很难确定这是《荀子》中的哪句话,不能猜译。于是在互联网上搜索“荀子”,在“中青网”的“大百科”下有“古典文学”,在其下有《荀子》的

目录,于是下载“天论篇第十一”,通过输入与“благородный муж”对应的中文词“君子”查找,得到“故君子敬其在己者”。经核实,《荀子》中的这句原文,与俄文本句和上下文均吻合。再去找中华书局的整理本,也查到了这句话,于是就可以断定,俄文原作者引的就是这句。用同样方式,找到了“сбережение Небо само приводит к сбережению к Пути-Дао。”是“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除了网络资源而外,现在《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大正藏》、《正统道藏》等都有光盘版,勤查这些光盘,可保证翻译中古籍还原的准确性和正确性。

(六)“中俄文典籍对读”法

中国的不少先秦、两汉的古籍都有俄罗斯的汉学家的俄译本,如《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道德经》、《庄子》、《诗经》、《楚辞》、《淮南子》等等。首席专家收藏了这些典籍的俄译本,将向有关子课题提供这些典籍的俄译本的复印件。如果翻译者遇到《大典》一些有俄译本的中国古籍中的引文,可先查俄译本,再根据俄译本的相应的卷号,回查相应的中文本,这样就可以确定《大典》所引中国古籍的准确的中文。同时有一些中国古籍的俄译本在互联网的俄文网站上也有,也可实行俄文的“网络查询法”。

(七)“专有名词统一”法

在《大典》的原著每卷的末尾的附录中都包括两个对照索引表,其一是人名、术语对照兼索引表,其二是书刊名对照兼索引表。对照索引表的左端是人名、术语、书名的俄文音译,右端是相应的中文字,如:“чань-сюе —— 禅学”;有的还加注俄文的意义,如,“Эр я и ——《尔雅义疏》(Пояснение к словарю “Эр я)”。我们翻译遇到原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名物的俄文音译时,这两个对照索引表会提供方便。同时我们统一整套书的专有名词时,也可参照每卷这两个对照索引表。但是应该逐一辨别每个名词,因为其中俄文、中文都有误。如前面的《尔雅义疏》中的俄文音译就缺

了“ш у”——“疏”。尤其要认真辨析《大典》两个对照索引表中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作出音、义完全正确的对照表,用以统一整个《大典》中文翻译中的专有名词,杜绝同一俄文概念,或同一中文词的俄文音译,在不同的卷中译成不同的中文名词的现象。尤其要注意汉学著作的中文译名,有的汉学著作有汉学家自己定的中文名称,一定用这个中文译名。

(八)“引用版本统一”法

我们应充分注意《大典》词条和文章后的参考文献提供的中国古籍的版本,尽量找到这个版本,以它为查中文原文的依据。在《大典》词条和文章没有指定特定的中文古籍的版本情况下,我们在对俄文中所引用的中文古籍和现当代文献进行还原时,要运用上述的“网络光盘查询”法和“中俄文典籍对读”法,找到中文的原文后,最后一步须核对目前通行的学术性版本,如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社出的点校本,若无这两家出版社的点校本,则应核对《四部丛刊》、《诸子集成》等;其他中文文献原文,也须核对公认的优秀出版社的权威版本,以保证《大典》所引中文文献的准确性、可靠性。

(九)“相关学科专家审读”法

四川大学文史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雄厚的科研实力。对一些包含艰深专业知识的文章或词条,在子课题完成译稿后,由首席专家和编委会聘请四川大学相应学科的专家,如哲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和艺术学等学科专家审稿,发现问题,提出修改建议,及时返回子课题组修改,以确保译文准确无误。如果须审稿的个别学科川大没有相应专家,则应在国内其他高校或学术机构外聘审稿专家。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985工程”南亚及当代国际问题研究创新基地、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文学与新闻学院)